

# 作家可以背对文坛，但不能背对时代

在重大的社会事务面前，作家可以做的事情并不多，文学能做的事情也不多，更多是专业人才、无名英雄在默默付出。即使如此，作为作家，依然可以做少量的事：以作家身份的记录、以公民身份的参与。栏目主持人李黎与广州作家陈崇正就这一话题展开对谈。

对话

1

李黎：你最近参加了广州市疫情发布会，接下来的几个月你将以志愿者身份度过，做出这个选择，源自什么样的理念？

陈崇正：从去年开始的疫情让我有了很多思考。第一个思考就是作家生活在这样的时代，真的太难了，置身其中，很容易就迷失方向。新冠病毒、人工智能、视频直播……所有这些都是全新的时代环境，是我们上一辈作家所无法想象的。就以其中信息传播方式的变革为例，长远看，它是有可能改变写作本身的。即使业界在反复重申手艺的传承和写作的尊严，但是在瞬息万变的信息洪流面前，文字很容易就沦为工具，而原本包裹在文字背后的思想与文化会变轻，变得跟一般人的生活格格不入。我们在很多社会讨论中看到对文学的误解，深层原因也是信息膨胀所带来的割裂。15秒的短视频成为备受欢迎的传播形式，99%的人再也难以静下心来阅读一部带有哲学思辨的作品，或者思考一个句子跟另一个句子之间是否存在。原本文学的专业发展可能在大众看来都是假动作。而信息传播方式的改变的另一个影响，应该是深层改变原来的文化产业生态，这是另一个话题了，包括当下出版业的艰难求存。所以，在这样的时代，作家何为？如何适应时代的变化，同时又保持文字的尊严，乃至拯救倾颓的文学审美，这可能是这一代作家最大的命题。

我是80后写作队伍中的迟到者，但所幸也见证了纸质出版的短暂辉煌，见证了电脑的普及和互联网的崛起。走过了新世纪的五分之一以后，又看见了科技与病毒的对峙——在人们以为人工智能已经牛气冲天，不日就要替代人类的时候，突然发现人类在病毒面前竟然如此渺小。所以，何妨笨拙地为这个社会做一点事呢？“物来顺应”大概就是这个词。

李黎：我看过你的一段视频，有段话你说得很好，大意就是，知识分子最好还是要亲身介入生活。这是一个关于生活本身的问题，我觉得是一个前提所在。你对此还有什么补充？

陈崇正：在我看来，文学已然是后置的艺术，但作家不妨躬身入局。所谓后置的艺术，是指文学会滞后于时代，即使有时候文学会成为导火线，但应该清楚地看到，所谓导火线也只是一个工具，工具性完成以后，改变历史的力量并不由文学直接产生。所以文学创作应该是后置的，是一种记录、传达、反思和再创造。在我个人的创作经验中，我其实非常警惕过分逼近现实对创作带来的副作用。最靠近现实的写作，不是报告文学，而应该是杂文时评，针砭时弊，直面问题。二十多岁那会儿血气方刚，我也喜欢写这种文章，还因为写时评文章被邀请到电视节目里参加辩论。但那次的经历带给我很多反思，我也没有成为一个时评作家，我在创作的

姿态上依旧是“后撤”的。作家当然要明辨是非，但是，文学的是非不需要明辨，而要站在想象力这边，站在审美这边。一个作家需要时间精力去完成文学传承中最重要的修炼。而在另一面，我们纵观海明威、契诃夫、苏轼以及我们熟悉的鲁迅先生，无不深度参与了他们的时代。作家与哲学家最大的区别就是人生经历的丰富性，哲学家可以深居简出，偶尔才出来散散步、喝咖啡，但大部分作家还是需要经验储备，需要在生活中去完成发现和建构。所以我们会看到那些伟大作家本身，都会有独特的人生经历。他们首先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在时代里遭逢，在时代里痛苦和感伤，然后才会有所发现，才会痛恨和赞美。作家的经验不需要全部亲历，但确实需要见证。文学不能没有想象，但很多生活并不是依靠想象就可以完成创造的。所以做就是了。古人所谓的“知行合一”，也强调必须去实证，去格物。

2

李黎：我觉得你身上有两个符号元素，一个是南方作家，从潮汕地区到广州，始终不离南方；另一个则是更为典型的“城市化”过程，这也是几代作家共同的经历。在这样的双重（当然也可能多重）身份影响下，你的写作有什么“雷同”或者不同？

陈崇正：一个作家的识别度一定与他的成长环境和人生经历息息相关。众所周知，广东在过去几十年太了不起了，而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广东人，可以说刚好经历了改革开放桥头堡的每一次脉动。广东本来是相对落后的地方，但自从外国人用炮火把我们的国门轰开之后，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广东在华夏大地上的戏份便越来越重。广东成为中华民族崛起的重要窗口和试验田，繁荣经济、探索制度、先行先试，广东获得了时代发展的机遇，也承担了改革先行者的职责。而在广东，潮汕文化又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她典雅丰富，细密柔婉，却又如此保守固执。在广东的经济版图中，潮州这个古城又长时间排名垫底，这里有很多地方跟珠三角差距巨大。我从潮州到东莞，再由东莞到广州，一路向西，不断走向广东的腹地，也是从边缘到中心的迁徙，这样的旅途有别样的风景。15年前，我带着潮州古城的童年和想象，来到务实奔腾的珠三角，来到被誉为“世界工厂”的东莞，后来又来到“千年商都”广州，我的精神世界其实面临多次破碎和重塑。更具体地说，当年一起写作的小伙伴们，包括身边认识的网友和网络上认识的兄弟，还在坚持写作的几乎没有了。对于我，写作是负剑孤往，是独鹤之舞，是用想象力去溶解快速掠过的世界，也是对故乡不断的回望。

李黎：“新南方写作”最近一直是一个热点所在，我个人因为不在南方，可以远观，所以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较为重要的概念，即有必要存在一种区别于别处的南方写

作、新南方写作。但是在阅读中，更多的还是一种“南下”的文学或者横跨广阔地域的写作，最典型的大概是丁燕了，从新疆到广州，似乎没有谁比她跑得更远。作为土生土长的南方人，你对这个概念有什么看法？对“新南方写作”可能出现的面貌有什么样的期待？

陈崇正：“新南方写作”这个概念最早是评论家陈培浩在关于我作品的评论文章中提出来的。那个时候我正在北京读书，和来自广西的朱山坡、来自海南的林森经常在一起聊天，我们都是来自南方以南，第一次在北方生活了这么长的时间，南北气候风物各不相同，也让我们有许多新的感悟。后来我们和评论家杨庆祥教授在一个文学活动中讨论到“新南方写作”的话题，杨庆祥认为这个概念中包含了非常广阔的空间，后续包括《南方文坛》在内的多家刊物也参与了讨论，引发了热议。“新南方写作”无疑是对“南方文学”这个概念的一个重要补充，提出了更为广阔而长期遭受忽略的南方。你如果问一个广东人哪里是北方，他们多数人会认为冬天会下雪的南京已经是北方了。但在北方人的概念中，南方便是上海南京，那么南方以南呢？过去几十年的经济腾飞，让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代表的新南方，变成一个可以赚钱的地方，但在文学的意义上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并没有被照亮，这里依然是文化上的南蛮之地。在这个意义上，中华文化的复兴应该是全面复兴，新时代的文学南方应该涵盖南方以南，甚至涵盖东南亚的华文写作。把文学版图中一直被视为暮霭沉沉的地方重新照亮，让华南、东南、西南和东南亚华文写作圈重新被纳入中国文学评价的体系之中，在这样的视野中重新盘点和厘定，应该会有超越原有价值认知的新发现。“新南方写作”不是固化的版图划分，而是一个新的角度，去重新审视充满变量的汉语写作。向南方的文学探询应该具有全新的学术意义，这个动作背后其实也是对作家和评论家的一种共同召唤，以期待带来惊喜的新作品。

3

李黎：你最新的长篇小说《美人城》应该是一部较有野心的作品，把当前写作的几大主流进行了综合，包括乡土、家族、志怪、科幻等几个大的元素。这方面你最初是怎么考虑的？你希望这部作品在你个人的写作中以及读者中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陈崇正：《美人城》是我酝酿多年的长篇小说，我明白这样庞杂的小说很可能被冷落，它讨好不了评论家，也讨好不了读者。但这篇小说对我自己很重要。乡土和家族跟我的童年经历有关，志怪和悬疑跟我的想象力偏向有关，科幻和灾难跟我的当下的思考有关。在这部小说里我动用了自己最重要的经验，它反映的不是现实，而是一种更为混沌的想象重塑。文学其实是作家与时间的对赌。一部作品是否变得重要，很多时候取决于它以什么样



李黎

1980年生于南京郊县，2001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现供职于出版社。出版小说集《拆迁人》《水群星闪耀时》。



陈崇正

广东潮州人，著有长篇小说《香蕉林密室》《美人城手记》，小说集《折叠术》《黑镜分身术》《半步村叙事》《遇见陆小雪》等。曾获梁斌小说奖、广东有为文学奖、华语科幻文学大赛银奖，有作品曾入围台湾第25届联合文学奖、第33届联合文学奖、2020年第三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初名单、2020花地文学奖榜等。

的方式概括这个时代，取决于它是否为时代提供了逼近真相的公约数。时代滚滚向前，而我只是一个快四十岁的中年人而已，我唯一的选择是顺着时代写作。作家可以背对文坛，但不能背对时代。当然，我这么说的意思并非这样一个长篇就把我自己给锁死了。“一本书主义”是很蠢的想法，那些高喊着要写出《红楼梦》，写出《白鹿原》的作家，最终可能写了一个寂寞。我自己的创作规划是要有打向世界边缘的组合拳，是像蜘蛛网一样不断向四周动态拓展的空间，是向未知领域的探寻。《美人城》是我这些年创作的一个总结，也是给我想象力的楼宇加盖了一层楼板，铺设了地砖，让一些模糊的想法变得更为明确，让本来漂泊的人物获得一个确定的生活。所以说它对我后面的写作很重要，这样的全方位盘点是我写作生涯的一次重要续航。

李黎：目前你是一家期刊的编辑，此前也一直是编辑，再往前是教师。职业跨度不大也不算小，如果再结合作家身份的确立，其间还是有很大变化的。能说说详细的变化和写作在其中的影响吗？

陈崇正：作家的最好职业就是作家，但大部分作家在成为职业作家以前，都必须有一份谋生的职业。这样说起来有点绕，但其实很好理解，那就是：写作的初始阶段，作家很难靠稿费供养自己和家庭，他必须有一份职业。所以村上春树开过酒吧，卡夫卡是银行职员，海明威和马尔克斯当过记者，毛姆还当过助产士，而在我们身边，大部分青年作家都会有一份维持生计的职业，比如编辑或者教师。作家的谋生职业确实不能太忙，但教师和编辑都太忙碌了，确实挤占了我很多创作的时间，主要是破坏了我创作的心境，让我写不出东西。这个时候我往往会很焦虑，就像一个生不出孩子的孕妇。我相信这样的痛苦在作家群体中是普遍的，但我也常常反省，应该还是自己才学不够，才会那么依赖周遭的环境。当然，作家也不能太清闲，我见过很多被清闲扼杀掉的作家，他们真的成为专业作家，就什么都写不出来了。到了一定年龄才会知道，过好普通生活对每个人都并非易事，但也许生活的焦灼更能推动一个作家毅然前行的决心。生活永远充满了艰辛，也充满了倦怠，作家的过人之处在于，必须在庸常的生活中腾出一只手来重塑现实，把现实置换到另一个世界中去。作家的幸与不幸都在于此。而在当下，疫情之后每个人都成为孤岛，我们会面对一个价值更为破碎的世界吗？我没有答案。